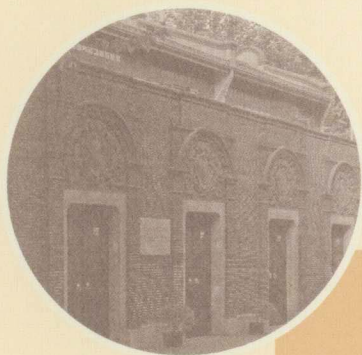




历史记忆

中共“一大”的 历史空间

熊月之 高俊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013054201

D220
32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历史记忆

中共“一大”的 历史空间

熊月之 高俊 著



D220
32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航

C16625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共“一大”的历史空间 / 熊月之, 高俊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4
(历史记忆)
ISBN 978-7-303-16089-1

I. ①中… II. ①熊…②高… III. ①中共“一大”
(1921) — 史料 IV. ① D2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47899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
电子信箱	gaojiao@bnupg.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g.com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0 mm × 230 mm
印 张: 9.75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策划编辑: 谭徐锋	责任编辑: 谭徐锋 刘松波
美术编辑: 谭徐锋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校对: 李 菡	责任印制: 孙文凯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目 录

第一章	多元经济中心的形成	1
1.	第一工商大都	1
2.	全国金融中心	9
第二章	城市交通体系的完善	17
1.	市内交通与对外联系	17
2.	邮政电信事业的发展	31
第三章	新文化运动策源地	40
1.	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40
2.	《新青年》创刊	45
3.	五四运动在上海	51
第四章	红星从这里升起	61
1.	工人阶级的觉醒	61
2.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67
3.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74
第五章	法租界与中共建党	82
1.	“一市三治”	83
2.	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法租界的活动	83
3.	会址选定的前后	89
4.	法租界的特殊性	100
附录一		119
附录二		135
后 记		149

第一章 多元经济中心的形成

上海是近代崛起的大城市。1843 年开埠以前，上海仅是东南沿海的一个普通县城。开埠以后，由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上海的经济和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19 世纪 50 年代，上海进出口贸易额超越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龙头，此后一路稳步上升。19 世纪末，上海已是举世公认的远东第一通商巨埠。辛亥革命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工商业迅速崛起，各种金融活动空前活跃，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到 20 世纪 20 年代之初，上海已经奠定了其作为中国多元经济中心的地位。

1. 第一工商大都

辛亥革命后，中国民族工商业得到快速发展。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伊始，就颁布了旨在振兴实业的法令。北洋政府时期，又先后制定了《公司条例》、《公司保息条例》、《农商部奖章规则》等法规。这些条例从形式上扫除了长期以来对工商业发展的种种限制，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官僚垄断的现象。从 1912 年开始，上海陆续成立了许多提倡实业建设的社会团体，如民生国计会、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工商勇进党、中华实业联合会、中华实业团等。与此同时，还出现了许多提倡实业建设的杂志刊物，如《中国实业杂志》、《中华实业丛报》、《中华实业界》等，客观上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①

^①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 8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7 页。



1896 年上海外滩庆典

民国初年,上海市政建设面貌一新,始于晚清的地方自治运动成效显著。1912年,上海拆除老城墙,修筑环城马路,改变了长期以来华界和租界间很少往来的局面。1914年,横在法租界与公共租界之间的洋泾浜填平筑路,两租界连成一片,老城区的南市和闸北一带也大规模扩展筑路,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上海经济的快速发展。

1912—1914年虽然只有短短的3年时间,但在辛亥革命胜利等一系列有利因素的影响下,上海的民族工业呈加速发展趋势,为以后的黄金十年打下了基础。这一趋势在面粉、缫丝、染织与棉纺织复制加工等业表现得最为突出。

面粉工业 辛亥以后,上海民族工业发展中,最值得注意的事件是无锡荣氏闯进上海,成功地在上海开办了第一家大工厂——福新第一面粉厂,紧接着开办了福新二厂。

福新一厂于1913年2月开工投产。资本4万元,其中荣氏兄弟各1万元,浦氏1.2万元,王氏0.8万元,实际开办费约为10万元。时有钢磨7部,日产面粉1200包,当年盈利3.2万元,股息24615元。初战告捷后,1913年5月,荣氏兄弟以年租2万元租办了开设于1906年的上海中兴机器面粉厂,改名中兴恒记公司,有钢磨12部,日产面粉1700包。同年冬,荣氏又以福新一厂盈利8.44万两,投资创建福新二厂。该厂的六层厂房建于中兴厂东侧,经恒丰洋行向美国胡而夫厂订购钢磨21部,1914年建成试车,年底开工投产,日产面粉5500包。^①

1912—1914年间,上海民族资本创办的面粉厂共有7家,其中除了以荣氏兄弟为主创办的福新两个厂外,还有著名企业家顾德馨、王一厅、叶山涛等开办的大有、立成、华丰、信昌、翊新等厂。7个厂面粉日生产能力为11900包。3年中新增生产能力已接近辛亥革命前11年所办各厂全部生产能力的2/3,上海成为长江流域最主要的面粉工业中心。

^①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3、35页。

缫丝工业 辛亥以后，上海的缫丝工业也得到较快发展，由1911年的46家丝厂、13 062部丝车，增长到1914年的57家丝厂、14 964部丝车，短短三年间分别增长23.9%和14.6%。这一阶段上海民族缫丝工业发展的特点有三：(1)新增的丝厂都由华商投资创办，甲午以前外商开设的4家丝厂，这时仅剩怡和丝厂一家，丝车54部，仅占上海全部丝车的3.6%。(2)华商丝厂改名易主频繁。据同业公会档案，1910年的44家丝厂至1914年仍然存在的，只有久成、锦成、震祥等十余家，其余都已改名易主。这表明，华商缫丝业虽然发展较快，但存在许多不稳定因素。(3)各厂投资额较高，经营规模较大。查这一时期，上海丝厂无论新厂、老厂，一般都有丝车两三百部，按当时的价格估算，每百部丝车所需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约在五六万元之间，1914年57家丝厂的资本总额约在800万元以上，投资规模是当时仅次于棉纺织业的第二个大行业。^①

染织业与棉纺织加工业 1912—1914年间，日本和欧美在上海棉纺织业的势力得到加强，对民族资本构成极大威胁，但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并未因为被人排挤而一蹶不振。他们及时调整投资方向，谋求新生计。一方面，扩大对原先未充分发展的织布业投资；另一方面，积极开拓新的行业，如针织、衫袜等纺织加工业。据有关资料记载，1912—1914年间，上海开办了一批使用全铁机的专业棉织业工厂，如群生布厂、大森染织厂等。其中，1912年由王启宇创办的达丰染织厂规模较大，享有盛名，该厂“有资本50万两，创制各色花布，自行整理，光彩绚烂，品质坚匀，直与欧货相颉颃”^②。另外，在使用手拉机或铁轮机(铁木机)或装备动力的全铁织布机织布工厂方面，有较大发展。1912年，上海有手拉机工厂二三十家，手拉机约2 000台。1915年，上海华商“组织之厂，南北两市，以及浦江左右，设有五十余所，其织机之数，零星不计，有数

^① 徐新吾、黄汉民主编：《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116页。

^② 刘大钧：《上海工业化研究》，第23页；上海市社会局编：《上海之机制工业》，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10~11页。

十张者，有一百余张者，统计在五千张以上”^①。

棉纺织加工业不断开拓新的生产领域，生产衫袜、毛巾被毯的针织业相继诞生发展。衫袜业起步较早，在1896年就有云章衫袜厂在上海诞生，不久，它为著名买办徐润盘买，改名景纶衫袜厂。1912—1914年间，上海又先后开办了富华、景福、公和、勤兴、百达、伟成等衫袜内衣厂。毛巾被毯行业中最著名的是创立于1912年的三友实业社，产品三角牌毛巾风行一时。上海针织业的诞生，与捷足洋行在川沙、南汇等地推销手摇织布机有关。1912年，在数家手摇织袜厂诞生的同时，上海民族资本开始引进电力针织机，开办了进步袜厂、锦兴针织厂、胜德织造厂等，生产衫袜、花边、毛巾、围巾、手套等棉织品。

总之，辛亥革命的胜利，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对于民族工业黄金时代的到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民族工业迎来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期。1915年，在日本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全国上下群情激愤，抵制日货，倡用国货，上海成为这一运动的中心。各界人士相继成立了“中华国货维持会”、“劝用国货会”等团体，创办了专刊《国货月报》，号召民众使用国货。五四运动前后，上海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出现了“抵制日货劝告会”、“劝用国货会”、“救国十人团”等群众组织，对于反制日货在上海市场的倾销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时也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② 这一时期，上海继续扮演着对外贸易领头羊的角色，以当时的两大机制工业品棉纺织业和面粉业的进出口为例，从1915年起，上海口岸的面粉出口量急剧增长，1916年到1921年的几年间出口总量占到全国总额的60%~70%，1920年更是高达83.7%。同时期的棉纱、棉布出口量约占全国出口量的60%~80%，针棉织品占全国出口量70%左右。根据海关进出口统计的数据，从1912年到1921年的十年间，

^① 《中华实业界》，1915年4月号，第22~23页。

^②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8卷，第89页。



1920年，上海王開照相館前“愛用國貨”宣傳

上海对外贸易快速增长,进口额从2亿关两增至4亿关两,出口额从1.6亿关两增至2亿关两,进出口净值从3.6亿关两增至6亿关两,十年间的平均比重占同期全国总额的40%以上。^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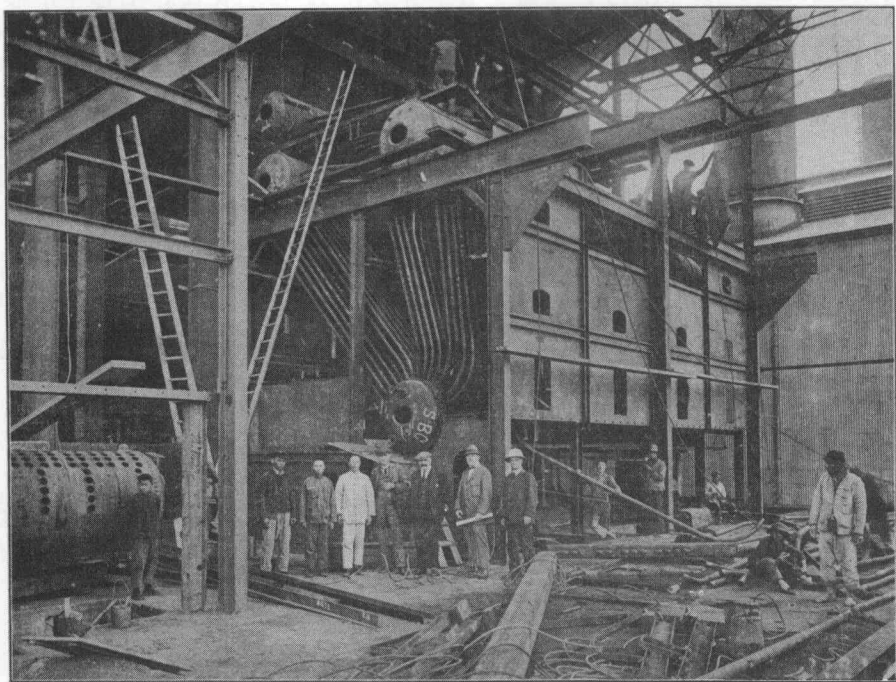
另据统计,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之间,上海历年开办的工厂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从1912年28家增至1919年的67家;上海工部局电气处出售用于各类工厂动力的发电量,从1911年的761 724度,增加到1919年的79 622 548度,增加了100倍之多。^② 电力供应作为现代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基本能源,增长幅度如此之大,足见此时上海工业发展增速之快。^③

在工业高速增长的同时,民国初年,上海的城市商业也日新月异,各类商店鳞次栉比、五光十色,成为中外闻名的“万商之海”。这一时期城市商业的快速发展主要表现在行业规模和行业种类的扩大上。1912年后,上海的洋货进口继续增加,洋货商业不断发展,经营洋杂货、五金煤铁、煤油、颜料的店号已有600家左右。随着洋货品种增多,商业分工细化,一些大的洋货行业分化出了一批新的行业和商店,如五金商业,1914年前是洋货商业的大行业,后来经营渐趋专业化,形成了一般工具、纺织五金、船舶五金等专营店。1918年后又分化出工具配件、钢铁管子、橡胶制品、纺织零件、绳索电焊材料等专业店。其他如纺织品商业、洋杂货商业、药品商业等分别分化出棉布、呢绒、绒线、百货、钟表、照相材料、西药等商业。此外,国货商业继续发展,当时的上海市场,随处可见各类南北货字号,竹木杂货店、铜锡器皿店、金银首饰楼、中药堂、鞋帽铺、茶食店、粮米店和菜场肉铺等在数量和分布区域上均有发展。随着上海国内“唯一之大商埠”地位的稳固,一批外地名店如张

① 数据来源:历年海关关册,转引自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8卷,第37页。

② 徐雪筠等编译、张仲礼校订:《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209页。

③ 参见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8卷,第三章。



上海杨树浦电厂

小泉刀剪店、胡庆馀堂药号等也纷纷迁居沪上，进一步充实了上海商业的种类。辛亥革命后短短的十年间，上海城市商业的发展已经取得长足发展，商业服务业网点遍布全市，密度和广度在全国首屈一指，商业行业应有尽有，无所不包，上海成为名副其实的万商之海，是当之无愧的东方巴黎。^①

从民国初年上海的城市工商业发展的方方面面来看，到中国共产党酝酿成立的1921年，上海已经完全奠定了其作为中国第一工商大都的地位。

2. 全国金融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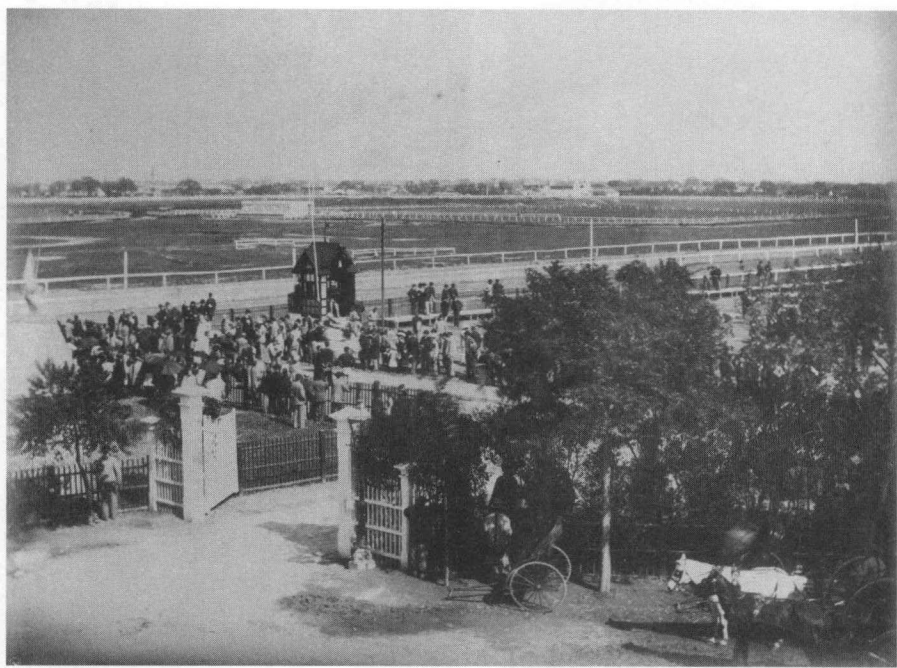
辛亥革命后的十余年间，上海的金融机构得到较快发展，银行、证券市场、保险业等日趋完善，奠定了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心的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华商经营的银行也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著名的盐业、金城、大陆、中南银行于1915年至1921年先后成立。这四家银行之间关系密切，代表着北方金融势力，人称“北四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也成立于这一时期，该行与辛亥革命前成立的浙江兴业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关系密切，代表着江浙金融势力，人称“南三行”。1911年华商银行存款总额不足1亿元，这时期，由于银行积极吸收存款，到1921年，一些重要的华商银行的存款总额已近5亿元了。^② 1913年浙江兴业银行的存款总额为294万元，到1922年已增长至2129万元。^③ 银行将资金贷给工商企业，又促进了这些企业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外国廉价商品大量涌入中国市场，民族工业遭受沉重打击，

① 樊卫国：《上海——万商之海》，参见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8卷，第60～63页。

②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编：《中国重要银行最近十年营业概况研究》，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1934年版，第298页。

③ 上海金融史话编写组：《上海金融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87页。



民国初期上海赛马

但上海的银行业仍然兴旺，军阀、官僚、豪绅、大地主仍有很多钱存入银行，为外国推销商品搜购土产的企业仍有间歇资金存入银行，有时银行也给这些企业放款。

1912年至1926年，官办的交通银行和商办的四明银行继续营业。官办的大清银行则演变为中国银行。1916年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在浙江兴业银行的支持下，抗拒执行北洋政府的停兑令并取得成功，保持了信誉，使业务得到更大的发展。1912年电报局将投入中国通商银行的20万两转作私人资本，使该行成为完全的私人资本银行。这时期，地方政府办的浙江银行改名为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将上海分行改为总行。“南三行”和“北四行”成为有代表性的全国性商业银行。这时期，上海新设银行总行50家，分支行18家，其中1920年至1923年开设总行31家，占新设总行总数的62%，开设分支机构8家，占新设分支行总数的44.4%^①，反映了当时上海银行业发达兴旺的情况。

辛亥革命后，上海原有的外商银行如有利、麦加利、汇丰、德华、横滨正金、东方汇理、花旗、华比等银行继续营业，这些银行进行金融经济侵略，凭借特权扼住中国财政金融的咽喉，居垄断地位。中国的关税存入上海的外商银行，在金融市场上，民族金融业资本余缺有赖外商银行调节，在国际汇兑、保险、金银进出口等方面也要依赖外商银行的支援。这时，外国银行在华活动以银行团为主要形式，异常活跃。辛亥革命前，英、美、法、德四国在伦敦组成了对华贷款的四国银行团，辛亥革命后，外国银行对华贷款权的争夺更趋激烈。1912年6月，俄、日两国银行加入，组成了六国银行团，接着五次给袁世凯政府垫款，共计1210万两，并酝酿更大数目的“善后大借款”。因美国银行没有得到好处，于1913年3月退出，六国银行团成了五国银行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与英法为交战国，俄国国内发生革命，五国银行团遂成为英、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旧上海的金融界》，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11、12页。

法、日三国银行团，但当时英法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无力东顾，实权操于日本之手。1917年日本银行向北洋政府共贷款3 000万日元，这引起了美国的不满，一再声明不愿日本成为中国的唯一债权国，表示不放弃币制实业贷款的权益。于是1918年7月美国邀集英、法、日三国组成新的四国银行团，美国取得了领导权。后来由于借款条件过分苛刻，军阀内部又有矛盾，以及上海、北京银行界的反对，新银行团的一揽子贷款计划中途夭折了。

这一时期，上海的外商银行也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首先是美、日、英、法等国银行势力膨胀。美国除花旗银行外新设运通、大通、美丰、友华、汇兴、菲律宾及中美合办的中华懋业7家银行；日本除横滨正金、台湾银行外，新设朝鲜、住友、三井、三菱、上海及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大东7家银行；英国除有利、麦加利、汇丰银行外新设大英、通济隆两家银行；法国除东方汇理银行外新设汇源及中法合办的中法实业、中法振业3家银行；荷兰除荷兰银行外新设安达银行；意大利新设远东及中意合资的华义两家银行。与以上银行相反，其他一些国家的银行没有发展，甚至走向衰亡，如比利时的华比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等。其次是外国银行实力相对削弱。当时各国都忙于筹集战费，上海的外国银行也抽回资金，原来对钱业拆票，这时变为中国若干资本雄厚的银行对外国银行拆票，如英商汇丰、日商横滨正金等银行，都曾向中国、浙江兴业等银行拆票或定期借款。最后是打破了国人对外国银行的迷信。如德华银行的清理，华俄道胜银行停业，中法实业银行无力兑付钞票，美国的美丰、友华、汇兴、菲律宾4家银行停业，中华懋业、中华汇业等中外合资银行的倒闭，使上海市民感到外国银行并非都是想象中的安全可靠，与其发生业务关系前也要注意对其信用程度的评估。

银行业之外，清末民初上海的证券市场也得到了长足发展。证券市场指各种有价证券包括公债、股票、债券等发行和交换的市场，是长期资金市场的主要方面（另一是长期贷款市场）。上海曾有过两家外商交易

所，即上海众业公所和日商取引所。上海众业公所(The Shanghai Stook Exchange)创建于1904年，主要经营外商公司股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交易曾停止4个月，北洋政府对之作严格取缔，股票市场濒于停顿。战后外货倾销，在沪的外商企业获利增加数倍，众业公所的股票交易又复兴盛。1918年6月1日上海日商取引所(即交易所)召开成立大会，11月开幕，12月2日营业，先交易棉纱和有价值证券。为避中国法律的约束，该所总所设在日本大阪，上海为分所，但交易均在上海进行。

华商办的证券交易机构以1914年在九江路渭水坊成立的上海股票商业公会为最早，该处主要经营公债、铁路债券、公司股票等现货证券20余种，规模较小。1914年12月，《证券交易所法》经北洋政府颁布实施。1920年7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在四川路1号开业，额定资本500万元，先收1/4，分10万股，经纪人200名，标的物分有价值证券、棉花、棉纱、布匹、金银、粮油、皮毛7部，虞洽卿为理事长，闻兰亭、沈润挹、盛丕华等6人为常务理事。

1920年11月，原上海股票商业公会改组成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1921年5月21日正式开业。资本额10万元，分2000股，每股50元，经纪人55名，经营现货和期货交易，主要是企业股票，后又以公债交易为主。^①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以125万元资本起家，在最初的半年里即盈利50余万元^②，这深深地吸引着想发财的人们，于是群起仿效，一时间形成了一个兴办交易所的热潮。市民追求暴利，认股踊跃，使此热潮更加升温。从1921年5月起，上海新设的交易所逐月增加，至11月底，上海已有了百余家交易所，平均一两天就新设一家交易所，交易所的名称几乎涉及所有的大宗行业。

① 张一凡、潘文安：《财政金融大辞典》，世界书局1937年版，第53页。

②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3页。